

广西师范学院博士点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文学教育识小录

贺根民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文学教育识小录

贺根民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教育识小录 / 贺根民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482-2148-7

I. ①文… II. ①贺…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1310号

策划编辑: 王翌沅

责任编辑: 严永欢

装帧设计: 庄海萌

文学教育识小录

贺根民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研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54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148-7

定 价: 28.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0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目 录

文学教育篇

- 文学教育：诗言志说的一个文化侧面 (2)
- 民国时期林焕平的文学教育观 (10)
- 论古代文论教学的取舍策略 (19)
- 古代文论教学的复眼透视观发微 (25)
- 古代文论教学的点面思维断论 (31)
- 美学教学的思维整合识小 (38)
- 师范生的毕业论文选题与创新思维 (45)
- 古代文学道德学的逻辑建构 (51)

技法篇

- 论苏轼的以戏为诗 (59)
- 方回《瀛奎律髓》的选诗观 (67)
- 毛评本《三国演义》的绘画之思 (75)
-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绘画技法 (83)
- 郭绍虞的文体分类观 (92)
-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方法论发微 (98)
- 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话“练字” (106)
-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文学地理观 (110)
-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的技巧观 (114)

评论篇

- 瘦冷：柳永词的一个文化侧面 (120)

《四库全书》不收《聊斋志异》考析·····	(126)
曹操形象的文学接受效应·····	(134)
《老残游记》：游记模式下的主体自觉·····	(141)
艰难跋涉：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148)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鲁迅接受林纾刍议·····	(157)
心灵悸动与赎罪情怀：论凡一平《撒谎的村庄》·····	(166)
《后悔录》：精神虐恋与生存迷惘的交叉·····	(172)
文化焦虑和审丑狂欢：基于“姐”文化现象的思考·····	(178)
社会转型之痛与人文坚守之重 ——基于大众视听文艺的考察·····	(184)
清代散曲鉴赏举隅·····	(190)
王国维经典言论赏析·····	(203)
后 记·····	(215)

文学教育篇

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官室，宗教，道德。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勉，有时丧我而惆怅，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

——鲁迅《摩罗诗力说》

文学教育：诗言志说的一个文化侧面

中国文学感物吟志的抒情传统规设了文学的发展与演进脉络，诗言志作为千古诗教之源，贯穿于整个文学的始终，并由此建构了中国文学的社会干预模式。诗言志是道德理性的符号化，借以形而上的语言和伦理评价隐喻构成一个复杂的功能体系，其根植于社会人生的政教与道德言说，构成传统文学取向的动态在场。诗言志的文本阐释基础和功能发挥场域都包孕着文学教育，侧重人物心志的用诗传统和对准社会事务的诗教模式铺设了诗言志说鲜明的文学教育色彩。

—

被朱自清先生誉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的诗言志说语出《尚书·尧典》，其文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①这段记载早期文学理论诞生的文字，其生成年代直接关合文学经典的发生源头，古风先生梳理了当下学术界关于诗言志说的四种通用说法：尧时说、远古说、战国说和秦汉说，认为诗言志肯定要比记载它的《尧典》成篇时间早，因为先秦经典大都有一个从口传历史到书写历史的过程，进而推测诗言志产生于殷商时期。^②诗言志说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先秦文人述而不作的习惯致使其往往从《诗经》中取材，来彰显礼乐文明的特征。假诸乐声和舞蹈等手段来言志，即作为一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庙堂的礼乐文明和民间祈祝传统共构，远古祭祀中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仪式存在，就诉求了神人共和的理念，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礼乐特质。中国文学的杂文化生态，就说明诗言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命题，附著《尧典》而流传后世的存在事

^①（汉）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

^②古风：《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

实，就告白其发生之时的精品内质。这种以言志永言为方式的文化行为旨在规范人们的礼仪道德，其理论预设就不无如何教育贵族子弟的考虑，这种以诗为媒介的乐教观念担当起陶育健全人格的责任，允符了先秦的用诗传统。

任何经典的形成，都是时代风云淘洗的结果，诗言志说的经典化密切联系着华夏文明萌茁之时的文化形态。据《左传》记载，较早运用诗言志材料的是春秋时期的赵孟，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引《诗》言志已成为诸侯国外交领域的普遍风气。《汉书·艺文志》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焉。”^①礼乐之风的浸染，以言度意的赋诗之习对应了外交辞令的需要，外交领域的现实需求，客观上催生了一股基于《诗》的文学教育风气，为了谋求外交领域的应对自如，基于《诗》的文学教育也就是一种社会需要。孔子激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慨然以恢复周礼为职志。孔子设教的文学一门就以《诗》《书》《礼》和《乐》为基本科目，《论语·泰伯》设置了诗、礼的发生关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②。朱熹认为：“《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也而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③诗与礼乐相互表里，因为礼的牵制而得以深层次的发展。“不学诗，无以言”^④，诗是当下社会进行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工具，对于用诗者而言，引诗言志，哪怕是断章取义式的认定，也蕴含诗意飘飘的人文气息；而相对于接受者而论，听诗观志，进行形象的比附，强化了诗的社会功用。对此，学者的看法足可参考：“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与‘诗言志’这一特点相联系的另一方面，则是诗的教育作用。”^⑤因采诗而推及对民风时政的考察，诗言志的覆盖场域便由原始的神灵祷告演变为对既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或理想社会模式的阐释。“诗”的道德规设与阐释主体的经验世界存在同一性，援“诗”来阐释经验世界的活动便使得其道德世界充满了诗意。如果说早先的祭祀仪式中的用诗还停留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的话，那么自《诗经》以来其中大量的雅诗和颂歌已逐渐归结于对宗族英雄创世伟绩的礼赞。这种贵族之间酬酢宴饮上的赋诗，根基于文学的想象力加强了宗族间联系纽带，借民族史诗张扬民族自豪感和维护政教伦理。

①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5~1756页。

② (宋)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③ (宋)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④ (宋)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⑤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先秦的用诗虽不无抒发自我怀抱的色彩，但归其一点，这种情感的发申还是未离开政教之说的藩篱，相对而言，儒家的诗言志说多追寻道德伦理的深度，而道家层面的诗言志说更趋向于审美体验，二者在对立互补中不断整合。孟子、荀子接续了诗言志的政教伦理言说观，《孟子·万章上》载：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①

在传统的以意逆志阐释理论背后，隐寓复杂的道德话语权力。咸丘蒙借《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论质问孟子对待舜“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的宗法礼制和社会权力的悖论，从而道出诗言志说的隐喻色彩，这正如学者所论：“无论‘诗’是指称《诗经》，还是指称普泛意义上的诗，无疑，诗是主体‘立言’的方式，而诗的‘立言’必须在儒家经典的法则下把审美体验规范于道德伦理，最终酿就一种隐喻的表达。”^②《荀子·儒效》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也，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也。《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③从诗言志到诗言道，隐含着理性精神的发扬，就诗的哲学指归来找就文学教育的延展脉络。相近的意旨亦见于《庄子·天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④借诸儒生之口，点明文化典籍所包孕的自然万物规律，这种假诸诗言道的功能设置，彰显了文学教育的本体论。职是之故，诗可以化育

①（宋）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② 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65页。

③（战国）荀况：《荀子》，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④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释》，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83页。

万物、陶冶性情，它并非停留在悠远的历史时空，而是活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具有深邃的精神指导作用。

二

汉代是一个国力雄富、疆域辽阔的封建王朝，社会到处弥漫着大气磅礴、激扬奔放的帝国气象。《诗》《书》等先秦典籍在汉代被尊奉为经，汉儒往往以一副据经解义的口吻来阐释社会人生。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就直接将“诗言志”书写为“诗言意”。董仲舒强化志与社会政权的关系，以“志于礼”的言说来标举言志的教化效应。《毛诗序》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旗帜鲜明地发扬诗歌的抒情特质，正因为诗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②之效。他们既客观承认诗歌应该“吟咏情性”，又不得不设置相应的堤坝：“发乎情，止乎礼义”^③，只有这样，诗方会“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④。这已初步认识到诗与礼的差别，诗由上及下，由小及大，将情、志统一起来考虑，诗便具有普泛的教化功能，如此，借诸文艺形式，抖露了以诗改变民风的文学教育方式。汉儒眼中的诗言志仍多从属于政治教化，汉儒拈出“诗教”之说，《礼记·经解》援引孔子之语明确地申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⑤以温柔敦厚来框定诗教的内涵，显示根基于中和之美传统的教化色彩，沿此而下，作诗者只要恪守教化之旨，就可以彰显文学的社会干预效应，这就强化了诗教说的德本色彩。正统儒学的光辉覆盖了诗歌的言情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伏下了后世文学改弦更张的契机。

魏晋六朝鼓荡着一股个性解放风潮，汉末的社会动荡动摇了传统道德大厦的根基，诱发名教危机，诗言志说一度沉寂。士人应对社会的路径慢慢向内转，趋向人格精神的内省和自我心境的透视，文人更乐于以缘情来标榜诗歌的本性，虽然发愤以抒情的诗歌实践，屈原、宋人已早著先鞭。诗人创作或以山

①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②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③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④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⑤ 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5页。

水之趣或假诸咏物着题，张扬在恶浊官场之外的人生感悟，丽辞华语、吟咏情性，以及芄然勃兴的宫体诗，心灵的放纵部分遮蔽了单一的载道观念。诗言志说的教化倾向，往往会忽视了创作主体的情感特质和艺术自足演变规律，就此而论，诗缘情说的出现就是诗言志的一种反动和革新。但是不得不承认，诗以言志之于六朝文人仍为一种重要的话语指向，《文心雕龙·明诗》载：“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故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① 引典释义，发申诗的政教功用，在凸显宗经理念的同时，不无文化教育的潜在追求，特别是其侧重情性去归纳诗歌的本义，已显露儒家正统色彩下的求实趋向。梁昭明太子萧统标举“义归乎翰藻”的取录原则，其《文选·序》云：“诗者，盖志之所志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② 在一片重情尚丽的诗歌创作呐喊声中，将诗歌之志皈依于儒学风雅之道，点明诗言志观之于魏晋六朝隐而未彰的理论生机。

六朝而下，唐音高唱。无论是独立苍茫的初唐诗人，抑或高歌猛进的盛唐文人，大多痛斥六朝诗坛的绮靡之声，呼唤刚健昂扬的建安风骨。诗国风潮的更替，促使诗言志说部分改变它既定的发展途辙，呈现尚情的审美趋向，彰显注重情感陶冶的特质，加重文学教育的意会和悟道。但是，有唐一代，诗言志说的教育功能始终未被排除在唐代文人的视野之外，初唐陈子昂的兴寄之说，张扬诗风新变之际，不失美刺政教传统的发申。皎然《诗式》载：“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③ 得意忘言、不立文字，显情性之真、得风流自然，唐人意趣雅致可见一斑。中唐以降，深沉的忧患意识，促使诗关政教传统上扬，白居易赋诗的“补察时政”之说，已表明中、晚唐文人体认作诗政教功能的集体意识。韩愈、柳宗元兴起的古文运动，形成与理论界桴鼓相应的创作新路，也显示了言志传统的回归。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载：“况属词之公，言志为最，自鲁、毛兆轨，苏、李扬声，代有遗音，时无绝响。虽古今异制，而律吕同归。我朝以来，此道尤盛。”^④ 以追求达意真淳为职志的李商隐，即便在诗抒性灵之时，不失体现王道基础上的教化色彩，足显诗言志观教育功能之一斑。中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关口，宋型文化的发轫，斯时的言志说表

① 周明：《文心雕龙校释译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② 陈宏天等：《昭明文选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③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④ （唐）李商隐：《李商隐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现出侧重本性的理趣色彩，直接开启了宋代的诗言理观。

三

崇文抑武的宋代，理学思想标领一代风骚。沾溉理学文化，构成理学与文学的相互发明，传统诗教经受理学思想的改塑，偏向涵养性情一隅，以道德眼光来权衡诗歌。理学家邵雍《皇极经世全书解》载：“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①理学家折中政事、明心见性，以实用精神来强化诗教，高扬“性情之正”大旗，致使言志之诗逐渐演变成抒发理性的工具，此类真心诚意的平和之诗凸显儒家道德教化之说。宋代士人往往集文人、学者两种身份于一身，汲汲于继承传统文明成果，滋生强烈的尚典意识。盛行于有宋一代的江西诗派，奉杜甫为不祧之祖，就包含对其伦理人格的尊崇。在宋人的文化视野里，杜甫不仅是诗法、诗格的典范，也是驱遣百家、代雄新变的高标。追求个人之趣与邦国之志的有机统一，杜甫的诗歌实践便得到宋人一致的颂赞。张戒就以“思无邪”为好诗标准，推戴诗歌羽翼辅教的教育功用，他极力称扬杜甫《哀江头》等诗，其《岁寒堂诗话》载：“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②在张氏看来，说理论事，并非诗歌正途，只有趋向杜甫式的言志一途，才不失诗歌本意。接续诗言志的传统，主文而谏，张扬温柔敦厚的诗教。

性命、理智之说排比成诗，在宋代自有一定的存在空间，而其枯涩僵硬的道学气息，却遭到元人的批判。从晚宋走过来的方回强调抒发真情实感，树立诗言志的传统。元人作诗，以盛唐为法，而其论诗，却标举温醇和雅之旨。元代江西诗派传人刘将孙《九皋诗集序》云：“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而岂观美自鬻之技哉？欣悲感发，得之油然者有浅深，而写之适然者有浓淡。志尚高则必不可凡，世味薄则必不可俗。”^③文学可以在情感的自娱中获得身心的完满，追求高格的诗歌创作成为文人教化理念发扬的一种具体手段。明代的官方思想是理学，而心学的勃兴，高扬了以道德修养为指归的理性精神。明初李东阳《王城山人诗集序》载：“夫诗者，人之志兴存焉。故观俗之美与人

① 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②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页。

③ 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之贤者，必于诗。今之为诗者，亦或牵缀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① 不满于台阁体诗歌的平庸肤浅之貌，李氏属意诗歌的感发志意特质，借径古人格调来求得自家诗歌创作气象。吴宽《匏翁家藏集·公余韵语序》云：“夫诗以言志，志之所至，必形于言。古人于此，未有弃之者，故虽衰周之人，从役于外，而诗犹可诵。况生于今之盛世者乎？盖退食自公，宣其抑郁，写其勤苦，达其志之所至，亦人情之所必然者。”^② 参以先秦诗歌的可诵特点，强化诗歌言志与抒情的统一。斯时的诗歌创作与理论申说凸显了教化传统基础上的情感效用，相近的意旨亦见诸汤显祖《董解元西厢题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也者，情也。先民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也。嗟乎，万物之情，各有其志。”^③ 汤氏贵生主情，以情反理，攻伐理学戕害人性，高倡人文启蒙。这形象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文学思想领域的情理之争，也强化以情感人的文学教育取向。

清代是中国诗学的集大成时期，清初士人多从社会现实入手，接续“诗言志”之说，凸显其社会教化作用。钱谦益《爱琴馆评选诗慰序》载：“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④，在其看来，该志表露为情、气、境三个层面，强化诗歌创作的言志本位。针对明人模拟古人的趋向，钱氏的诗“本于言志”之说更具有现实价值：“古之为诗者，学溯九流，书破万卷，要归于言志永言，有物有则，宣导情性，陶写物变，学诗之道，亦如是而止。”^⑤ 赋予诗歌基于主观感情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作诗之旨》视“言志”为作诗的根本，展示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叶燮《原诗》以才识胆力来考察言志的高卑、大小和远近，其论：“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如是者其诗必传，正不必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⑥ 叶燮论诗关注到诗歌艺术的情理、虚实等诸多命题，这既自觉皈依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又提倡实际创作中的灵活性。袁枚以开放的视野来看待诗言志说：“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⑦ 即使是诗之根本的志，往往会因为时地的变迁而随之变化，袁氏标榜性灵说，强调诗人真性情的重要性。清

① 吴文治：《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9页。

② 吴文治：《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9页。

③ （明）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2页。

④ 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⑤ 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⑥ （清）叶燮：《原诗》，见王夫之等《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93页。

⑦ （清）袁枚：《袁枚全集》（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代中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开篇就论确立“言志”和“无邪”之旨，是诗之美的一个根本所在，历数六朝以降陆机、谢灵运“斗靡骋妍”的不当，提倡诗歌创作的有补诗教的社会功能。至万马齐喑的晚清，社会板荡，诗关时务政教之说大畅其道，魏源借《诗比兴笺序》发挥言志传统，直面易代乱离之纷象，抒发拯时救国之怀抱，从而促使诗言志说彻底走出抒发个体心志的旧辙，迈向更加广阔的社会天地。

发端于以《诗》设教的诗言志观，浸染时代文化精神，在政教和审美所筑就的文化长河中奔突前行。闻一多先生《文学的历史动向》云：“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①诗言志说如同它所依附的载体一样，是一个包括道德、教育、审美诸多因素在内的文化体系。人文化成的诗教传统，展示中国诗学的教育色彩。打造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修养和理想抱负，成为诗言志这一中国诗学经典命题的一以贯之的教育趋向。自先秦的人文教育发轫，至唐代的载道理路，诗言志说裹挟或显或隐的实用追求。先秦的言志之说，大多依附于史学和哲学言说的卵翼之下，基于道德说教而灌输儒家思想。借文艺手段，铸造人格精神，诗言志说的教化色彩，促使历代士人积极地参与社会，弘道济世，展示强烈的担当意识。道德价值与审美取向的融合，强化诗言志说应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意义，亦就此构成个人心志与群体意识的化合。缘于六朝以来人本位意识的觉醒和解放，逐渐拓展了言志说的理论框架，形成一个包孕情感在内的复杂文化体系，慢慢加重诗言志倾向于受众内在心理的文学取向，张扬政教功利追求之时的审美教育特质，从而形成诗言志说由外向内、内外兼取演变的教育趋向。

（原文载《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6期）

^① 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民国时期林焕平的文学教育观

文学书写是文人的身份标识和精神表征，它展示他们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把握力度和参与社会事务的幅度。中华传统文明基于宗法伦理垒筑了一座文道合一的文化大厦，文学教育是夯实大厦根基的重要手段。自先秦的诗言志说发轫，诗教观念一直是历代文人乐于拾掇的文化工具，道德训诫和经世致用作为文学教育外在价值体认的基本方式，往往因其影响社会的程度而展示了文学教育之质的规定性。勤勉不懈的林焕平先生，秉承忠贞不渝的民族情感，一生致力于复兴民族文化，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他倡导文学为人生的创作理念，助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他积极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实践，坚持文学反映现实、扬善阐恶的观念趋向，展示文学教育强烈的时代色彩。

一、肉搏现实：强烈的战斗精神

林焕平与时俱进，以追求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为职志，在理想的指引下走过了20世纪。他从小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中学时代耽读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作品，爱好创作，心仪当作家。1930年夏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投身革命洪流，开始以笔为武器的战斗生涯。1933年9月受周扬委派，东渡日本，奉命恢复左联东京支盟，留日期间，林焕平任东京支盟书记，兼任《东流》杂志主编。1937年5月回国，先短期逗留广州，任广州美专美学教授，旋即奔赴香港，任广东国民大学香港分校文艺学教授，兼陶行知等人所办的九龙业余学校文学课教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林焕平逃脱日寇魔掌，返回桂林，先后在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西南商专等校执教。1944年10月，桂林被日侵占，林焕平奔赴贵州赤水任大夏大学教授。解放战争爆发后，林焕平又赴香港与民主人士一起创办南方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林焕平任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兼任广西文联、广西作协副主席、桂林市文联主席。自参加左联起，林焕平一直活跃在文艺战线的前沿阵地，抵制日寇的文艺侵略，参与文艺论争。他主张文艺创作自由、评论自由，指引了人民文学的方向。林焕平撰著繁富，著述近千万字，撰有《林焕平文集》10卷、《林焕平译文集》5卷、《林焕平编选著作集》5卷。

林先生后半生致力于广西的文教事业，孜孜矻矻、励精笔耕，是晚近广西的一块文化界标。

民国时期，林焕平“扮演”过诸多角色，其中一以贯之、始终未曾掉色的可能还是文人本位。文艺是人生的形象折射，以文学为手段，谋求文学与革命的统一，是实现动荡年代文学教育效能的重要方式。晚清以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燃烧文人的救国革命激情，“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想藉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革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目的的”^①，梁启超标领的“小说界革命”凸显文学新民的时代使命，振奋民族精神、改造国民品格，梁启超作为晚清文学教育的先驱，强化了文学教育与时代洪流的对接力度。民国以前的文学教育大多臣服于道统的规设，在修齐治平的既定轨辙中彰显着功利取向，林焕平盘点古代的文学教育脉络，褒奖孔子的引领作用。1945年其《中国文艺思想史述略》指出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开启了文艺与政治的绾合潮流：“孔子是我国提出文艺思想的第一人，他是我国第一位教育家，所以他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他是很想在政治方面发挥自己的天才而终未能如愿的政治思想家，所以他很重视文艺的政治作用。”^②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作为我国文学教育的第一人，周游列国，极力输出其贴近现实生活的诗教观念，他鄙弃强制教育，以文学为移风易俗、推进社会的武器，导引文学教育的功利趋向。千古文化之脉，代有传承，林焕平认为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文学教育传统，大致不脱肉搏现实、表现现实的藩篱。全民抗战时期的文学书写，自然应当表现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活，歌颂奋不顾身、为国捐躯的时代英雄：“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时代？是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中争取自由解放的抗战建国时代。……我们现在需要描写抗战建国的实际生活的诗；我们现在需要歌唱中华儿女的英雄主义的诗；我们现在需要暴露敌人的罪恶、汉奸丑态的诗。”^③弘扬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讴歌浴血抗战的火热现实，向新式的风花雪月般的花样文章说不，成为抗战文艺的必要构成。深切体验抗战烽火，拒斥个人呓语和虚伪涂饰，服务于抗战成为当下文艺的第一要务，抗战需要陆游、郭沫若般具有战斗锋芒的诗人，而不欢迎“采菊东篱下”悠然自适如陶渊明般或“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倾心佛理和山水如王维般的诗人。用最科学的方法武装头脑，深入挖掘生活，抱以鲜明的爱憎，更能彰显作品的教化功用。1943年其《论文艺的神圣使命》倡导：“文艺作家对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不静观，不旁观，以一种最热烈的态度，投进这种生活里面，混成一片，是体验现

①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② 林焕平：《林焕平文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③ 林焕平：《林焕平文集》（第2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实的最妥贴的不二法门。”^① 在国家和民族存亡之秋，寻觅文学避难所或徘徊于十字街头，显然不合时宜。职是之故，文学创作应当书写我们的时代生活，展示其鼓舞士气的功效。“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及其野蛮的暴行，我国举国上下，全民一致，精诚团结，在政府与革命领袖指导下所展开的全面持久对日抗战——前线将士的浴血拼命，后方民众的组织训练，救亡运动，促进生产，汉奸的跳梁及肃清汉奸运动……这一切，都是现阶段文艺的主要题材。”^②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素为文学教育必须理清的问题，以救亡、政治为主体的叙事话语压倒了独标文学自律的个人话语，文学启蒙任务因为民族救亡主题而中断，便放大了文学砥砺士气的工具色彩。

文学并非天外的魅影，时代感召文学去弘扬正气，讴歌时代英雄。林焕平多次强调：“普通我们写文章，当然要挖掘现实的秘奥，表现现实的本质，只有如此，方可以达到文章指导人群的目的，完成文章改造社会的任务。”^③ 文学是改善人生、服务社会的有效手段，掬一把辛酸泪，一头栽进恋爱游戏里去寻找消遣，或者叙写无关痛痒、不着边际的文字，凡此种种，均有悖于抗战的时代要求。中原板荡、山河破碎，文人更应弘扬民族正义和发抒担当精神，书写反映社会主旋律的伟大作品。文学的教育作用，就在于利用书中的纸笔，承担鼓舞人、创造新人的使命。只有敢于拥抱生活，准确地分析社会时势，才能直面尖锐复杂的现实斗争，把握时代主题，这亦非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关涉思想认识的正确与否。谷柳的《王长林》、艾芜的《猪》主题贫弱，游离了抗战的现实斗争，即为作家只注重艺术手段而忽略文学教育的有力注脚。文艺抗战是军事抗战的积极配合和补充，在非常时期，团结一切颂扬正义的文人，亦是全民抗战的需要。林焕平指出：“艺术家的笔杆就是兵家的枪杆。它也是击退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有力武器之一。因为我们的文艺既不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无病呻吟，幽绿沙龙的肉色陶醉。它是现实的反映，是典型的现实里的典型的性格的表现。”^④ 弘扬正气、挖掘社会生活中的阳光，自能彰显文艺的抗战效能。就此而言，除了投笔从戎、直接奔赴前线，运用手中如枪杆般的纸笔，不失为抗战时期文人支援前线的一个理智的选择。

救亡压倒一切，文艺审美教育部分让位于文艺的政治鼓荡，文艺服务于抗战成为当下文学教育的最好表达。与其斤斤于逼仄的家庭悲剧或少年回忆来倾

① 林焕平：《林焕平文集》（第2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② 林焕平：《林焕平文集》（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③ 林焕平：《林焕平文集》（第2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④ 林焕平：《林焕平文集》（第2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